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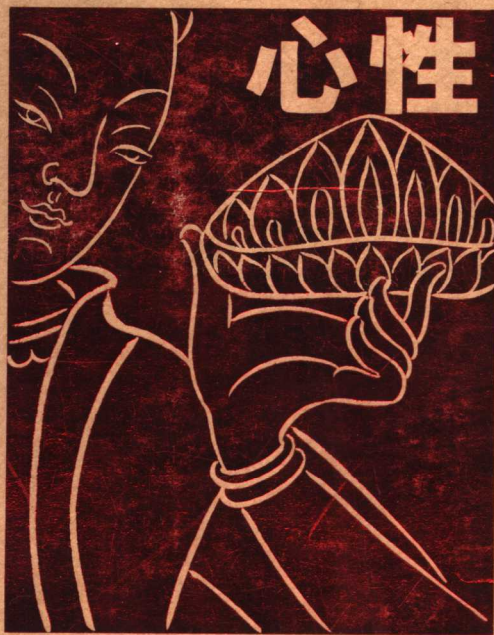
SHENTI·XINXING·QUANLI

新社会史
XINSHEHUI SHI

2

◎ 黄东兰 主编

身体



权力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舍会
XINSHEHUI



◎黄东兰 主编

SHENTI·XINXING·QUANLI

身体 · 心性 · 权力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心性·权力 / 黄东兰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9

(新社会史丛书.第2辑)

ISBN 7-213-03131-7

I. 身… II. 黄… III. 社会史学-中国-近代-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868 号

身体·心性·权力

黄东兰 主编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 责任编辑 吴晓红 汪维玲
- 责任校对 叶 宇
-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0.5
- 字 数 28 万
- 插 页 2
- 印 数 1 - 3000
-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131-7
- 定 价 2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知识社会史的视线 / 1

黄东兰 孙江

一、“翻译即背叛”? / 1

二、记忆与忘却的空间 / 3

三、身体话语与权力 / 8

四、挣脱羁绊的社会史 / 10

心性·记忆·表象

太阳的记忆 / 16

——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

孙江

一、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 16

二、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 18

三、太阳诞辰话语的文本化 / 26

四、记忆与忘却的再生产 / 31

五、结语 / 37

“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 / 43

潘光哲

一、初晓华盛顿 / 43

二、“华盛顿神话”的形成与复制 / 47



- 三、“华盛顿神话”的多重乐章 / 53
- 四、“华盛顿神话”的政治效果 / 56
- 五、“华盛顿神话”与革命风潮 / 61
- 六、结论 / 63

领土·疆域·国耻 / 77

——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

黄东兰

- 一、引言：作为地理空间的疆域与领土 / 77
- 二、地理教科书的“领土空间”表象 / 80
- 三、失去的空间：地理教科书的“疆域空间”表象 / 87
- 四、空间的丧失与“国耻” / 92
- 五、“国耻”的具象化：《中华国耻图》的空间表象 / 97
- 六、结语 / 102

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 / 108

——从“黄花岗公园”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王晓葵

- 一、引言 / 108
- 二、黄花岗起义和纪念碑的建造 / 111
- 三、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建设与纪念碑 / 119
- 四、纪念与祭祀：“革命先烈纪念日”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122
- 五、结语 / 127

中山陵：政治精神的表达与实践 / 132

李恭忠

- 一、选址南京的政治内涵 / 132
- 二、建筑精神的构想 / 135
- 三、空间、装饰与建筑效果 / 139
- 四、仪式行为与建筑精神的实现 / 143
- 五、结论 / 149

身体话语与权力

论自杀 / 156

——“五四”前后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与价值选择 海青

一、引言 / 156

二、自杀和暗杀：个人价值及社会理想 / 158

三、“五四”：青年的牺牲 / 171

四、“自杀时代”的奋斗 / 182

五、结语 / 200

为龙体把脉 / 211

——名医力钧与光绪帝 张哲嘉

一、奇书：《崇陵病案》 / 211

二、力钧的中西医新理论 / 213

三、力钧进宫 / 215

四、光绪与力钧的医患对话 / 218

五、力钧出逃 / 226

六、结论 / 227

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 / 236

[美] 苏成捷 (Matthew H. Sommer) 撰 李霞 译

一、招夫养夫 / 236

二、一妻多夫的谱系 / 241

三、问题 / 252

四、结论：婚姻和卖淫 / 257



预防传染病话语 / 263

——转折期的日本近代国家与卫生

[日]阿部安成 撰 孙茜 译

一、引言 / 263

二、养生与预防 / 265

三、预防与控制霍乱 / 269

四、清洁·摄生·隔离·消毒 / 275

五、结语 / 277

认识论的回转与新社会史

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像 / 282

杨念群

一、新医疗史叙事的背景：三个模式 / 283

二、模式转换与本书要点 / 287

三、医学传教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 / 291

四、“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 / 299

五、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 / 306

六、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 / 308

场、常识与秩序 / 315

[日]岸本美绪 撰 罗冬阳 译

一、“地域社会论”的不定型性 / 318

二、方法上的个人主义 / 320

三、不安的历史学 / 322

四、日常生活的意义构造 / 324

编后语 / 331

黄东兰

引言：知识社会史的视线

黄东兰 孙江

一、“翻译即背叛”？

1904年，蒋维乔等编撰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八册）出版后，颇受欢迎，一版再版。^[1]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宗旨，商务印书馆的一则推介广告词写道：

是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亦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此外，如修身、历史、地理、博物、格致、卫生、农工商之实业，亦举其概要。读者既卒是书，于立身处世之道，以及世界古今之大势，与普通应有之智识，无不略具。不特可为学堂教科书，亦一般国民所不可不读者也。书中所附图画彩图，皆有关于学识，非徒为观美而已。^[2]

上面这段文字一共出现了二十余个或新或旧、亦新亦旧的词语，这些本来属于少数精英的话语知识，在20世纪中国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之时，即轻装便衣走进了新式学堂的教科书里，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物。文以载道，亦能覆道。清政府在被迫推行教育制度改革之时，清楚地意识到承载近代知识的“各种名词”的泛滥所造成的“文以载政之用”^[3]。意味深长的是，当黄龙旗易为青天白日旗，历史迈入共和时代后，蒋维乔等将上述教科书略作修订，更名为《订正



最新国文教科书详解》(八册)继续刊行,在新写就的编辑宗旨里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4]。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歧、帝制与共和的更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代意义的“知识”(knowledg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episteme”,原意指与人的主观意见(doxa)相对应的、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里把知识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知识”三个层次,认为理论知识来自知性的“观照”(theoria),是人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关知识的讨论笼罩于基督神学的阴影之下,近代知识的发生和扩展是知识获得“自由”之身,从而摆脱以超自然力量解释和叙述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过程。伯克(P. Burke)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的或实用的知识,当其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体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s)使之合法化”^[5]。基于此,伯克所进行的知识社会史研究,乃是要挖掘欧洲近代知识所依托的社会历史背景。

相比之下,中国对近代知识的翻译、生产及其社会化的过程比较复杂,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的分别。面对翻译而来的近代知识,清政府担忧“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6]。但是,这种被翻译的知识是否原汁原味的近代知识,堪称传播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对此是有怀疑的:“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7]“翻译即背叛”(译自意大利文 TRADURRE È TRADIRE)。严复的批评道出了汉译名词在传递近代知识时的局限。

其实,在“参用杂糅”和“含混闪烁”的问题之外,中国语境化的近代知识的社会化也许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蒋维乔在批评严译

著作缺乏“明白晓畅”时曾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蒋在宣统元年(1909年)闰月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惟其所用术语必舍近今通行者而自造名词。……必力求高古典雅，则其离实际益远，转使读者迷眩。岂著书牖世之本意乎？严氏喜自矜博洽，而其蔽则艰深，胥此类也。”^[8]蒋维乔长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他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对严译著作提出的批评，说明在关于承载近代知识的新词语翻译上，不同立场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严复之言是就汉语近代知识之生产、翻译能否准确传递近代知识而言，蒋维乔之语乃是指近代知识如何传播而语。在追寻中国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时，这一龃龉无疑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

西学东渐下的19—20世纪的中国，在大量流入的近代知识中，最受中国人重视的是有关民族—国家的知识。在传统的空间表象的国家叙事里，“疆域”是标识自他关系的核心概念，当“领土”(territory)这一近代国家观念介入后，“领土”和“疆域”发生了交错紧张关系。黄东兰的论文《疆域·领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通过分析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探讨了在疆域与领土的重叠结构下的地理空间表象，特别突出了“国耻”话语在空间表述上的意义。这种传统与近代交错下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在历史、国文等教科书里也有清楚的显示。以教科书为媒介探讨中国语境化的近代知识是新社会史研究者试图勾连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一个尝试。

二、记忆与忘却的空间

在由人的理性和感性建构的知识体系里，作为人的知性活动的记忆与忘却占有一席之地。历史存在于叙述和记录之中，所有表述化的历史都涵盖人对过去的记忆与忘却，因此，当记忆与忘却本身承载了作为“现在时”的历史知识时，有关记忆的方法、形式和目的也成为一种知识性的存在。以研究记忆技巧的历史而著名的英国学者耶尔茨(Yaltes)在《艺术与记忆》一书中，有一节涉及古希腊记忆技巧



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次家庭宴会上。

传说古希腊有位贵族举行家宴,这位贵族按照其时的习惯,请来了当地著名的抒情诗人西蒙尼得斯(Simonides)为其唱赞美诗,答应事后付给诗人丰厚的报酬。西蒙尼得斯在席间吟诵的诗句除了赞美主人之外,还顺带赞美了卡斯特尔(Castor)和婆琉克斯(Polux)这两位勇敢的双胞胎神。小心眼的主人为此很不高兴,声言只能付给其一半的报酬,另一半应该由诗人赞美的双胞胎神付出,由此发生了争执。就在这时,有人传言门外来了两个陌生人要求见西蒙尼得斯。诗人出门探视,但并没有看到要找他的人。诗人正在纳闷之时,身后的大厅轰然坍塌,参加宴会的人尽皆丧生。原来,两个双胞胎神预知大厅即将坍塌,为了报答西蒙尼得斯对他们的赞美,特地赶来解救诗人——算是给其补上了另一半应得的报酬。惨祸发生后,死者的尸体受损严重,面目全非。唯一幸存的西蒙尼得斯凭着对宴会现场的记忆,首先回忆在场之人的席位,最后辨认出每一位死者的身份。^[9]

西蒙尼得斯何以能一一记住所有死者的席位呢?原来他使用的是古希腊雄辩家们常用的“场所”和“形象”记忆法。这种记忆法通过类推法确定对象的空间位置即“场所”(locus),然后再凭借“形象”来进行检索。古希腊以降,这种记忆技巧一直保存下来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17—18世纪学者的著述仍有很多关于记忆技巧的文字。但是,正如耶尔茨在书的结尾处所说的,随着近代知识的大量生产,记忆技巧在欧洲人的知识中边缘化了。

耶尔茨《艺术与记忆》初版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80年代后研究历史记忆兴起后才为学界广泛关注。同时,进入学者视野里的还有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Halbwachs否定将记忆视为个体的和主观的产物,这一点对理解集体记忆在近代国家建构中的意义非常重要,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同时,不能忘记的还有一个人——尼采,他在《反时代的思考》中有关对历史的批判有先驱之功。^[10]

记忆进入历史学者视野的外在契机同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和和历史记忆有关。在同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展开的交锋

中,一个个当事人的证词“现场直播”了个体记忆中的“战争”,致使日渐远去的战争的影像突然反照于现实生活上,人们发现作为历史的战争虽然过去了五十年乃至六十年,而记忆与忘却的“战争”并未停止,相反,记忆与忘却的再生产似乎还有加速之势。除此之外,历史学者关心历史记忆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认识上的方法论的回转不仅击破了历史“经验主义”的自信,也给意欲充当历史学“救世主”的社会史研究当头一棒。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埃文斯(R. Evans)在《守护历史学》一书中写道:“尽管不断接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死亡通知书,但是,社会史没有死。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史放弃了将自己视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的主张,有的论者即使不明说也准备对此立场加以放弃,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谓之社会史的解放者。”^[11]埃文斯既然承认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史的批判正中要害,何以又不无自信地宣布社会史仍具生命力呢?原来,社会史研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时,也对自身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大众心理、记忆、纪念物、节日、文化层次上的权力与权威,以及社会性别和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给社会史研究注入了关于语言、文化和思想的新内涵。

讨论历史记忆和讨论民族主义问题一样存在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条运思路径,客观主义者强调记忆的“历史性”,而相对主义者则重视记忆的“虚构性”,在这一对立中,“传统的创造”(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观点具有调和作用。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认为许多貌似“悠久”的传统,其历史其实很短,是近二三百年来被发明与创造出来的^[12],这打破了对传统与历史的本质主义认识。但遗憾的是在当今讨论民族主义和历史认同问题时,它和安德森(B. Anderson)著名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13]一样常常面临本质主义化的曲解——在揭示民族国家的非自然性时,论者有意无意地营造了一种传统的创造或发明的“传统”。就有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讨论而言,人们在强调近代与过去的非连续性的同时,把近代



又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连续性的过程。孙江在《太阳的记忆》一文里指出建构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伴随着忘却,忘却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士民为了纪念明朝皇帝崇祯之死,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神话,假以儒家和佛道祭祀仪式表达哀痛。明亡后,当士民将亡君亡国之痛的公共记忆附会为一个民间宗教节日后,三月十九日公共记忆便开始了其忘却之旅。但是,历史忘却并不是直线的,乾嘉年间,一些不满清朝统治的民间教派把三月十九日写入自己的经典《太阳经》中,试图以“太阳出现满天红”所象征的“末劫”来临,鼓动业已忘却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汉族社会起来反清。20 世纪之初,这一公共记忆的再生产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反清排满的革命者通过纪念崇祯之死,把三月十九日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之中,并赋予其近代意义。意味深长的是,在两岸对峙下,台湾一度出现对三月十九日历史记忆的复制倾向,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创造。

如果说,孙江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历史记忆与认同的自画像的话,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则是一幅想像和叙述他者的图像。明清以前,已有众多的西方“圣人”进入儒道主流文化语境,内化为中国文化“自我”的有释迦牟尼,属于少数特定群体认同对象的有耶稣、穆罕默德等。然而,总的来说,19 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国语境中,西方人物的形象以反面为多,19 世纪中叶之后才发生逆转,到 20 世纪初,欧美甚至日本历史上的“群星”大量进入近代知识体系,成为各种新式教科书中的常客。美国历届总统中,为独立而战并且功成身退的华盛顿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另一个是为平等而战的林肯)。这位美国国家的缔造者和民主政治的楷模,在民国的修身教科书中被描述为自幼“诚实”,勇于对父亲承认自己砍断了樱桃树:“予虽触父之怒,不可不为真实语。”及长,为人“谦虚”,“华盛顿苦战八年,击败英法兵,美国独立,厥功甚伟。一日,公民会议,华盛顿莅会。议长见之,盛赞其功。华盛顿面赤耳热,不发一言”。^[14]这种华盛顿道德话语是如何传入中国并被不断再生产的?

其中的生产再生产机制具有什么特征?潘光哲在对近代华盛顿话语的详细考察后,认为华盛顿自为中国人知晓之始,就被纳入理想的政治制度中,被叙述为实践民主的典范。研究政治文化的亨特(L. Hunt)认为,政治象征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权力的手段及其目的。^[15]华盛顿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传衍似乎并不尽如亨特所说,亨特所说的作为权力的手段和目的的政治象征和仪式可以从王晓葵《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和李恭忠的《中山陵:政治精神的表达与实践》中看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以往涉及建筑和石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性史迹上,关于表征近代的象征物之研究似乎还很少。^[16]王晓葵通过对黄花岗和广州革命烈士陵园的分析,试图揭示在近代公共空间形成过程中革命政党、政治权力、地域社会、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黄花岗公园从1911年到1935年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有不同的个人和组织的参与,在纪念碑的形制、种类、空间构造等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透露出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信息。与此相对,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由于是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所建,主要体现了单一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历史认识。但是,两个不同的建筑群都意欲把历史记录通过“神圣时间”与“神圣空间”的结合,渗透到国民之中。也许,和潘光哲的华盛顿研究可以遥相呼应的是那位裔出法国、来自美国的“自由女神”。“自由女神”的被仿建、拆毁和重建凝聚着不同岁月的风风雨雨。李恭忠对于中山陵的研究视角与王晓葵略有不同。李恭忠认为,学界以往对中山陵的研究多着眼于建筑群本身,对于背后的政治内涵少有深入研究,以致至今人们对中山陵的认识没有脱去国民党人当年的宣传话语,即把中山陵的政治文化内涵简单地理解为“警钟长鸣”、“唤起民众”。该文以“开放的纪念性”为切入口,认为与中国传统陵墓不同,中山陵具有平民气质,其建筑风格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超越个人记忆的空间,同时却具有鲜明的“党化”色彩。近年来,在欧美和日本,关于纪念碑、铜像等近代建筑物的研究十分兴盛,在各种研究中,诺拉(R. Nora)所组织的“记忆的场



所——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的研究最为重要。这项由130位学者参加的巨大的学术工程,分共和国(La Republique)、国民(La Nation)和法国内部的多样性(Les France)三大主题,编为七卷本出版。^[17]中国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积累尚少,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

三、身体话语与权力

“身体话语与权力”是本书探讨的第二个专题。

海青的《论自杀》直接涉及了人所面对的永恒主题:死。出生、疾病、寿命、死亡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曾研究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的死及其对死的追悼之问题,认为清末的各种死与明清交替之际表达政治忠诚的死不同,除去谭嗣同略带为光绪牺牲的意味外,几乎都是在反清中表达为国而死的意愿;而对死者的追悼在赋予死以政治意义的同时,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利用的一面。^[18]那么,海青研究的特点如何呢?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五四”前后知识群体中的自杀现象,指出“牺牲者”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被预定,并在其后的街头演讲、与军警对抗、被捕等活动中得到强化。学生们力图传达出的信息并不单纯为了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他们更是自己所排演的戏剧的第一观众。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似乎因统摄在爱国话语的强力之下而呈现出单一性的特点,其实,“当我们把剧班的规模缩小,并对每一场演出发生的场景分别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人们的预期以及所达到的心理满足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是大异其趣的”(作者语)。不难看到,海青与吉泽的不同之处不仅在考察的对象上,更在于方法上,海青切入死者内心世界的分析使得在近代主义的历史叙述下被视为为政治而死的话语在历史的语境中“复杂化”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民间广泛流行着一种“迷信”,据说瘰癧病(scrofula)——淋巴腺结核病患者经国王触摸后即可痊愈。对于这

种唯有国王才有的巫术般的权威,马克·布洛赫(M. Bloch)从其实际运用和意欲使之产生效果的动机之间的关系上专门予以考察,并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与这种超自然能力的关系。^[19]早已不依赖巫术维系皇权的中国皇帝居于深宫大院中,他们没有巫术般的权威,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老病死的缠绕。19世纪末,生活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根据西太后深居简出和被招入宫内的医生的神秘行迹,曾揣测寡居的西太后有了身孕并曾秘密堕胎(见张哲嘉论文注[1])!这个话题虽然令人感兴趣,但无从证实。张哲嘉《为龙体把脉》根据名医力均进宫给光绪诊病的记录和回忆,君臣二人的医病对话,不仅凸显了中西医观念的差异,也可让人窥知宫廷这个私人—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力学关系,人们发现原来“老佛爷”(慈禧)也怕因果报应,嘱咐手下体恤小民。壮志未酬、身体羸弱的光绪帝,原来无师自通,堪称中医的高手。

传统医学发生在特定的“私人空间”,在建设自他界限分明的近代秩序过程中,医疗行为被置于“公共空间”下,成为近代国家秩序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阿部安成的《传染病话语与近代秩序》为我们展示了近代日本建设卫生秩序的过程。饶有兴味的是,在宣传预防传染病知识时,明治政府将被国家排斥在近代秩序之外的民间佛教和神道动员起来,使之担当起宣播近代卫生知识的作用。这种动员传统资源推进近代化的方式,和中国近代把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视为“迷信”而一概加以排斥的做法截然相反。“卫生”一词在古代汉语里的意思与“养生”同,源于《庄子》和《黄帝内经》,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使用。至于日本语中现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的出现,作者在文中指出,近代日本将“卫生”对译“sanitary”的是卫生局长长与专斋。关于长与专斋,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长与曾将自己选择的卫生一词询之于随清朝赴日的傅云龙,得到了傅云龙的肯定。^[20]

所谓传染病预防就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规训。福柯对精神病和监狱的研究展示了国家与权力是如何规训和监视国民的。但是,国家与权力不可能笼罩社会的每个角落,福柯的规训话语亦非普遍适



用的分析工具,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对于17世纪中国婚姻状态的分析,揭示了儒家有关身体的社会规训化话语和实践的限度。虽然官府记录的当事人的供词未必尽可相信,但是论文举证的各种罕为人知的“一妻多夫”的案例,使我们看到了国家—社会规训话语与日常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缀上一笔的是,“一妻多夫”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恰恰反证了妇女身体的从属性特质。

四、挣脱羁绊的社会史

在对本集收录的上述论文进行一番概括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知识具有非常鲜明的非自明性特征,当一个个体系化和概念化的历史知识被还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时,历史学原来始终处在岸本美绪所说的“不安”状态。

众所周知,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欧美、日本和中国等历史学界相继出现了“社会史热”。在回顾社会史兴起的早期历史的时候,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中曾经说过,他和马克·布洛赫之所以选择所指宽泛、意思暧昧的“社会”一词,“是按照历史之神冥冥之中的指引”,“在自由的批判和主导精神”下,不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让过去的人群浮出地表,在可能的社会框架下,按照时序研究其多种多样的活动和创造”。为此,既要“撤除藩篱,进入邻居的庭院”,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又要将个案研究置于社会全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地为探讨下一个问题敞开门户。^[21]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学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把结构化、概念化叙述模式里的“历史”营救出来,可以说是社会史重新回到费弗尔所说的原点的返祖现象。但是,这种社会史尤如一帖“镇静剂”,只是暂时缓解了历史学的“不安”,不久,人们即发现社会史的这种对历史的细分化的努力,根本没有消解历史学的“不安”。因为“不安”的源头来自于对历史学本身的质